

#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剥削批判： 实践机制、批判进路与学理展望

金栋昌,张玲,王静宜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数字技术诱发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劳动时间增加悖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产消一体”模式和资本加速循环模式成为典型的劳动时间剥削机制,迫切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阐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在数字劳动定义、劳动时间异化、劳资关系和剩余价值等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进路,讨论其形成的共识,论述其存在的不足。研究发现,从本质上看,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剥削机制模糊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其深层危害在于打破稳定的劳动关系;由于当前在理性批判上缺乏整体观,造成了与新型数字劳动观、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数字劳动批判的学理缺憾。研究表明,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未来应着力在以辩证思维构建数字劳动时间批判体系、运用学科交叉叙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批判体系、以问题导向构建超越劳动时间异化的理论方案等方面进行拓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技术;劳动时间;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5)04-0001-16

收稿日期:2025-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KS169)

作者简介:金栋昌(1985-),男,河北承德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 Critique of labor time exploit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practical mechanisms, critical approaches, theoretical outlook

JIN Dongchang, ZHANG Ling, WANG Jingy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triggered a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xtended labor time. In digital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prosumption” model—whe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intertwined—and the accelerated circulation of capital have become typical mechanisms of labor time exploitation. This calls for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to explain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labor time exploitation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Building upon existing studies on digital labor definition, labor time alienation,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surplus value, this paper explore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digital capitalism’s exploitation of labor time, examines the emerging scholarly consensus, and addresses existing limita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ssence of labor time exploit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lies in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labor time and leisure time, with its deeper harm being the disruption of stable labor relations. The current rational critique lack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resulting in theoretical deficiencies in critiquing digital lab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forms of digital labor outlook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innovating in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constructing a dialectical framework for critiquing digital labor time,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critique system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narratives, and proposing problem-oriented theoretical solutions aimed at transcending labor time alien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gital capitalism; digital technology; labor time; surplus value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作为数智技术与资本深度融合的产物，数字资本主义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和

劳动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数字平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载体<sup>[1]</sup>，它不仅形成了“数据、技术、资本”三位一体的新型

垄断结构,还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深度组织和控制,劳动组织形式“弹性化”特征增强,数字劳动者陷入“算法囚笼”,导致工作时长与劳动强度被智能系统精确调控。这导致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从工厂延伸至生活领域。实践上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关系的重塑,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跟进,尤其需要从劳动数字化角度来把握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特性与本质。意大利学者 TERRANOVA 率先从学理上梳理了建立虚拟网络、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在 MUDs 和 MOOs 上建构虚拟空间的活动<sup>[2]</sup>等数字劳动外延,并指出数字劳动的广泛存在性。NIXON 提出了受众劳动<sup>[3]</sup>范畴,LUND 则称其为“玩劳动”<sup>[4]</sup>。克里斯蒂安·福克斯采取广义数字劳动概念,提出了“关于数字媒体的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及无酬劳动”<sup>[5]</sup>的数字劳动形态。国内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有关研究主要从数字劳动的劳动形态<sup>[6-9]</sup>、劳动关系<sup>[10-13]</sup>、主体困境<sup>[14-16]</sup>等维度展开了相关批判。现有研究阐发了不同的数字劳动观,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内涵与外延、劳动形态转变等提供了参考。

时间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剥削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分析“机器体系科学发展以及资本劳动过程的变化”时就提出了“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sup>[17]</sup>的论断。相应地,在数字时代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变化特征,揭示其新形态的剥削机制也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这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和方法论,在厘清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规律和特点基础上,揭示当前理论批判的逻辑特征与不足,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视角的学理创新。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旨趣。

## 一、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实践机制

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现实形式直接表现为对劳动者时间的占有,本质上是通过“产消一体”和资本加速循环模式,将数字劳动者的非生产性劳动时间隐形转化为生产性劳动时间。在“产消一体”模式中,雇佣数字劳动者和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中均被卷入劳动时间剥削进程,从事双重意义上的劳动,劳动时间被无形延长;并且伴随着资本加速循环趋势,劳动者在生产端的劳动时间延长、在消费端的劳动强度加剧,劳动时间剥削的隐蔽性显著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产消一体”模式和资本加速循环模式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实践机制。

### (一)“产消一体”模式中劳动时间剥削的二重性

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重塑劳动关系。一方面,新型“产消一体”模式中劳动者身份呈现双重性,导致劳动时间在量上显著增长、在质上也加重了对资本的依附;另一方面,资本循环运动表面上似乎以加速循环的方式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与循环时间,但却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频率和效率上持续增加

劳动强度,实质上加剧了劳动时间的剥削程度。

数字平台的受众叠加数字劳动者与数据生产者的双重身份,数字劳动者既是商品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者,也是数据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数据创造者,构成了“产消一体”的数字劳动特色。数字技术资本化条件下,劳动者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数据积累,会转化为数据创造活动并形成数据商品。同时,资本利用算法推荐技术等,延长“产消一体”劳动者的在线时长,使其在生成、浏览、共享数据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生产数据的劳动,无酬闲暇时间转变为无酬劳动时间。由此,资本对劳动者的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休闲时间。在数字化新型剥削场域中,雇佣数字劳动者与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中均被卷入劳动时间剥削进程中,所以两者被剥削的过程可视为一个剥削循环,雇佣数字劳动者为资本家既生产一般商品,也生产数据商品;非雇佣数字劳动者既消费数字产品,又生产“一般数据”。这种“产消一体”模式让劳动者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着双重劳动,广义劳动时间在无形中被延长(图1)。

数字技术资本化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生产数字化促使数据与信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并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参与新形式商品(数据商品)的资本循环,但其在本质上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痼疾。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并非自然存在物,而是源自主体活动的人造物。在生产数据资料或数据产品的过程中,其关系始终挣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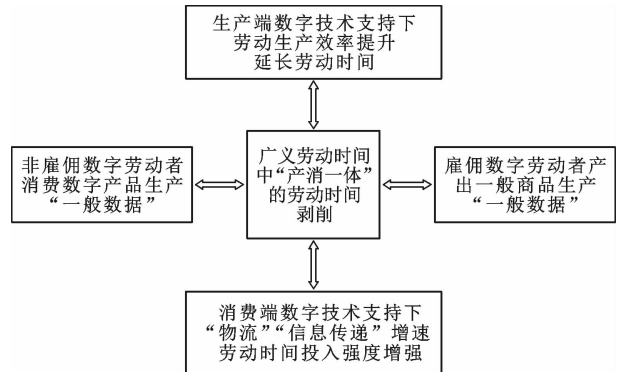


图1 “产消一体”模式下的劳动时间剥削机制

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数据私有属性与数据产权商业化、资本化之间存在张力,并会在劳动时间剥削上更鲜明地表现出“产消一体”的资本运作特征。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sup>[18]</sup>数字资本主义“产消一体”的剥削模式,在现代精准数据分析技术加持下,活脱脱呈现出“评分算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明察秋毫的守卫,是现代版的百眼巨人”<sup>[19]</sup>的属性,不断地将资本循环周期压缩、资本周转速度加快,并在总体上极大增强数字资本的剥削程度,不断提高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效率,资本的增殖本性也随之愈发强烈地表现出来。

## (二) 加速化的资本循环加剧劳动时间剥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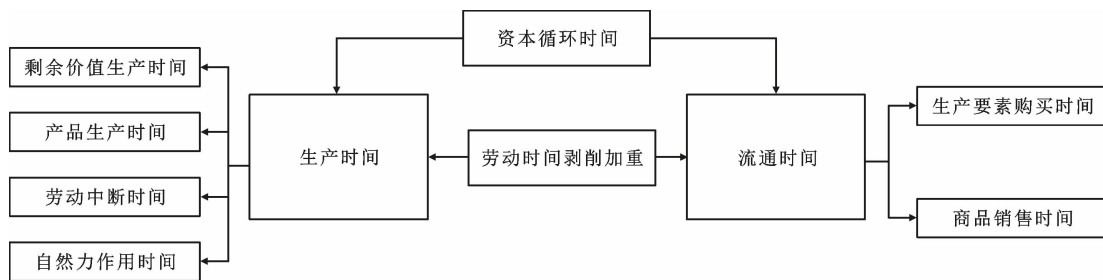
在“产消一体”与资本逻辑并行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增加劳动时间成为资本逐利的有效手段。“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20]</sup>数字资本主义建构的时间资本化机制使数字化的资本最

大程度实现了对活劳动的吮吸。随着资本全球扩张,生产要素非物质化促使劳动过程丰富化、劳动剥削加剧化,以致于劳动时间被挤压到极限状态。资本借助现代技术对劳动者进行控制,使劳动生产率提升,并对资本的循环加速提出了新要求,这意味着数字化的时间模式使得日常生活、消费和时尚等社会现象都必须适应资本快速增殖的需求,从而导致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手段加速资本运动,卷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劳动剥削的对象,劳动时间剥削也必然随之加重。

资本的内在逻辑要求社会加速,资本增殖和时间加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需。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增殖与资本循环时间呈反比例关系,资本增殖是资本循环的结果,借助资本循环加速的方式可使资本增殖的能力变强。从时间角度看,资本循环全过程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sup>[21]</sup>。资本总是追求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持续缩短,并不断采取多种手段来压缩这两个时间维度,以追求更高的效率。

这意味着“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sup>[21]</sup>资本增殖速度取决于生产到流通的周转速度,要加快资本增殖速度就需要生产到流通的循环速度加快,以单个资本循环时间缩短化和总资本循环时间次数最大化的双重手法来谋求增殖最大化。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也在这一加速循环中实现极大化(图2)。

资本循环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两部分,各有其运动规律。从生产时间看,作为资本增殖关键环节的劳动时间越短,生产效率越高。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循环加速的动机和条件更成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动能。从流通时间角度来看,流通时间包括生产要素购买和商品销售两部分时间。流通过程本质上是商品价值形式的转换过程,流通时间是对资本价值增殖的一种限制,资本停在流通时间越长,一定时期内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就会相对减少,进而影响后续的资本循环和再生产。所以,数字资本主义模式中的资本家不断优化仓储物流成本和效率、优化信息传递技术以缩短流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被迫提升劳动效率以适



资本循环加速状态下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加深劳动时间剥削的一般逻辑：  
社会生产生活加速-生产与流通时间缩短-资本循环加快-劳动时间剥削加重

图2 资本加速循环模式下的劳动时间剥削机制

应资本循环和周转速度。正像生产时间被极大缩短的趋势一样,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时间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减缩过程。

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加速状态,带来了数字化的生产和流通时间的缩减,但是以时间压力转嫁给劳动者为代价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运作建基于其对劳动时间的加倍占有上,数字技术和社会加速发展无一不是以数字劳动时间的被剥削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的悖论那样,“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sup>[20]</sup>

## 二、理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关系的逻辑进路

劳动时间是衡量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尺度,也是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范畴。既有研究聚焦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的新变革和新问题,并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来阐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归纳起来,当前理论界形成了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问题的以下逻辑进路。

### (一) 逻辑进路一:从数字劳动定义角度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

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命题。学者们主要是从“物质劳动”和“非

物质劳动”两个层面阐释数字劳动。以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学者将数字劳动理解为“物质劳动”,即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帮助下实现资本积累所需的各种形式的劳动<sup>[22]</sup>。互联网产销劳动是数字劳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剥削形式,具有强迫、异化和占有三大特征,数字劳动时间剥削亦贯穿于劳动剥削中。而以迈克尔·哈特等为代表的学者将数字劳动视为“非物质劳动”,将其界定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sup>[23]</sup>。“非物质劳动”摆脱了时空场域局限,这就导致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之间的边界日渐消弭,当劳动从工厂围墙延伸到“社会工厂”后,必然意味着劳动过程与劳动时空场域的分隔,带来的是全天候和全场域的劳动持续,并导致劳动时间日渐自由化和宽泛化。以上两种对数字劳动的厘定都蕴含剥削意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sup>[17]</sup>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者仍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客观条件相分离,这就无法改变资本借助劳动力作为增殖来源的前提,从而也决定着劳动时间剥削会以愈发隐匿和残酷的方式持续发挥效用。

### (二) 逻辑进路二:从时间变化角度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的异化

从时间变化角度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异化,主要侧重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维度。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重新组织和控制,从而

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获取剩余价值。数字资本主义以技术为主导,以平台垄断为关键,进行信息化生产,形成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业态,建构了全球化的网络生产和交易体系。这种社会形态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通过弹性工作制以模糊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利用算法控制和监视工人,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被延展,并运用数字手段处理、组织和管理价值创造与实现全过程。身处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中,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强度进一步加剧,数字劳动时间剥削程度也处于不断加剧之中。此外,“在资本与技术的深度嵌合中,资本主义进阶为以‘数字化运作’为资本增殖核心的新社会样态——数字资本主义”<sup>[24]</sup>。这种社会形态下劳动时间被“加速”,数字压缩的网络时间以纯粹的速度为导向,占据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忽视了时间的主体向度——人的积极存在。数字资本主义对时间的改造与应用不局限在生产领域,而是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社会性、政治性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下,非线性时间、可储存的数字化时间成为时间结构的新形式,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均表现为数字劳动趋势,非雇佣劳动时间也转变为数字化生存下的雇佣劳动时间<sup>[25]</sup>。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和对劳动时间的挤压,将人们的生产、交换环节全部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势逻辑中,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时间外延被拓宽,数字资本主义运作漩涡中的劳动时间在新的秩序下被重新界定。

### (三) 逻辑进路三:从劳资关系视角把握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

区分非雇佣劳动与雇佣劳动是阐释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重要范式。对雇佣劳动而言,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监督劳动者,对劳动时间实行精确控制,提升劳动生产率,强化劳动时间剥削。“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立足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灵活化发展的新形式。”<sup>[26]</sup>对非雇佣劳动而言,非雇佣劳动虽未形成传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但却构成数字资本开展劳动时间剥削的重要对象。学界普遍认同雇佣人员的数字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家占有互联网有酬劳动者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但对非雇佣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存在争议。“数据商品的价值并非由互联网用户即‘受众’创造,用户也并未受到互联网平台的剥削。”<sup>[27]</sup>一方面是“产消者”的数字劳动剥削,另一方面是原初无价值的数字劳动。分歧的存在说明了数字劳动的复杂性,但不管分歧如何,却始终在强调一个事实:数据、数字技术和平台的合力作用,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实现了由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弹性工作制”“众包”等新型劳动形式虽有利于聚合零散生产力,但数字劳动只要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背后呈现的资本逻辑就不会发生实质性转变,改变的也只是其具体的资本运作方式而已。归根结底,数字技术参与劳动过程,更高效地促使资本对劳动由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并呈现出“同心圆”<sup>[28]</sup>式、“中心-外围”生产方式。

资本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牵制劳动力围绕资本向外辐射,形成受资本力量控制的劳资结构,并导致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控制下被剥削得更彻底。

#### (四) 逻辑进路四:从剩余价值视角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占有方式

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劳动由满足自身需求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组成。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数字剩余价值可以成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及其时间剥削的又一重要视角。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看,资本家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关键在于延长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模糊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自由(闲暇)时间的界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往往是将“不仅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融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而且劳动者在现实中的偏好、欲望、个人发展性和享受性的活动等都被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sup>[29]</sup>。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主要是通过提高数字劳动生产率来占有数字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自动化是数字资本家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手段,通过引入自动化技术,将原本需要人工完成的重复性和简单性劳动交由机器完成,释放出的劳动力被重新安排到更复杂、更精细和更高质量的工作中。然而,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没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增长,反而导致劳动者以更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份额,从而加剧了劳动时间的剥削。另外,数字平台为了实现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在最大程度上

增加用户的在线时间,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从而提高各类数字劳动的生产效率。“数字技术展现对数字劳动时间强大的规训权力,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界限日趋消解。”<sup>[30]</sup>“数字资本从时空维度重构了生产时间,数字权力从社会时间等维度对时间体系进行系统规训,共同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双重驱动力”<sup>[31]</sup>,在数字技术加持的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者受到时间剥削而不自知。资本增殖的途径表现为既占有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又占有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果实,使有酬劳动创造新份额的剩余价值,使无酬劳动不停地转化为新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资本增殖采用了更加“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sup>[20]</sup>,利用灵活工作制度和超时工作要求,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从而加剧了劳动时间剥削的强度,并将引发更深的时间危机。

可以说,理论界对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问题开展了多视角和多层面的研究,并主要沿着经典的资本主义剥削维度进行数字劳动属性界定、劳动时间变化、劳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视角的批判性研究,为劳动时间剥削问题的批判提供了借鉴与思考。但既有研究在劳动时间剥削批判理论系统性研究角度上,缺乏从整体观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问题,亟须探索新视角和建构相应的批判话语。

### 三、理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共识与缺憾

当前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

的研究共识,集中在两点:一是认同剥削机制模糊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二是认同新型剥削生态最深层的危害在于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但辩证地看,已有认识仍缺乏与新型数字劳动观相匹配的系统性批判意识,同时也缺乏从劳动关系角度把握生产关系实质,从而导致对数字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缺乏整体性。

### (一)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奥秘在于模糊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界限

数字资本主义依托现代科技,既创造所谓的自由时间,又剥削自由时间,还将有偿劳动时间转化为无偿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这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内在奥秘。

资本家增加利润的方法便是占有劳动时间,将有偿劳动时间转化为无偿劳动时间,即延长并占有劳动时间。资本的趋向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时间。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了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看似缩减了单个资本的劳动时间,促使劳动的便捷化。但事实上,数字技术并未缩短总的劳动时间,反而造成了自由时间获得性悖论<sup>[32]</sup>。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传统雇佣劳动向数字劳动的转型,使得劳动与闲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进而引发了劳动的“新异化”。这种新异化表现为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劳动者自由时间被压缩。这也正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即“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都占有劳动”<sup>[20]</sup>。数字劳动更全面彻底地剥光了人作为人所拥有的一切<sup>[33]</sup>,并把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降为维持其数字生存的手段,使人的数字生活走向异化。乔纳森·克拉里认为,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利用数字通讯手段的全天候提供服务体制紧密相连,其模糊了睡眠与清醒的界限,“把它与劳动联系起来看的时候,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sup>[34]</sup>。质言之,资本家不止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而且利用数字“泰勒主义”模式将剩余价值最大化。这样一来,劳动者本就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更精细与系统化地切分、再分配。平台拥有者占有数字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劳动者永远陷入繁琐且复杂的广义劳动之中,平台拥有者的财富借此得以源源不断实现资本积累。自由时间本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sup>[20]</sup>,而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全面挤占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并以各种形式延长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毫无边界感的劳动与休闲,越来越容易对人的本质的实现形成更好的牵制。

### (二)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深层危害在于打破稳定的劳动关系生态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所蕴藏的深层危害体现在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上。这种重塑体现在劳动者范围的无形扩大化、劳动关系形成机制的灵活化和隐形化,以及劳动过

程的数字监督化。劳动关系的新变化不仅影响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条件,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态。

### 1. 劳动者范围的无形扩大化

相较于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范围的扩大化体现在由物质生产劳动者向数字劳动者的延伸,从实体的生产空间拓展至数字化的虚拟生产空间。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型劳动形态,相应地产生一大批有别于雇佣劳动者的新型劳动者(如无酬劳动者、受众劳动者、玩劳动者等),劳动者的外延获得新的延展。资本主义以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把劳动和“玩”联系在一起,当今“玩”是生产性的,是被资本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所有的玩乐,在当代条件下成为并纳入资本的剥削之下<sup>[5]</sup>。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仅仅局限于雇佣劳动者,其剥削对象获得了极大的拓展。数字劳动者不受时间、空间等限制,为更多人提供了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让他们陷入不断劳动、难以脱身的境地。此外,数字劳动准入门槛降低,劳动者范围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向外拓展。灵活就业带来劳动者身份的多元化,更多人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这会持续导致劳动群体泛化,劳动剥削场域不断延展,劳动时间被进一步占有和扩大。

### 2. 劳资关系形成机制的灵活化和隐形化

数字经济孕育出一系列新的劳动模式,如兼职小时工、独立承包人等非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新型雇佣关系的形成往往通过

互联网中介与雇主达成临时性劳动关系,其灵活性与隐蔽性极大增强。数字技术打通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移动时间”与“移动空间”提升了数字劳动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但新型劳动关系缺少事实劳动关系的保障,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数字劳动者易受到不公平待遇。同时,“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sup>[35]</sup>。数字劳动时间剥削表现出双重性——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与数字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价值。数据会被作为原材料商品出售给需求方,从而成为数字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来源。因为劳动者往往关注不到数字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劳动过程,劳动时间剥削机制由此表现出隐蔽化特征。数字劳动者成为游离型劳动力,非雇佣劳动剥削也日益成为现实。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劳动中的数字劳工这一表现形式,赋予劳动时间以支配性力量,并成功实现对劳动时间的灵活性和隐蔽性占有。

### 3. 劳动过程的数字监督化

人工智能与算法相结合,使得劳动过程的监控更全面、更精确。数字监督的后果就是资本家利用算法产生的数据,进行高效率的管理和监督,准确评判劳动者的劳动效率,直接调整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提升劳动强度。正如 MANOKHA 说的那样,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和传感器收集分析雇员的身体健康和行为表现,呈现

出的是代码行和数据流,资本家根据数据和代码分析劳动者的状况来进一步加大工作强度,大大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sup>[36]</sup>。在算法和监视技术的支撑下,“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sup>[20]</sup>,实现对劳动者时间的精准控制,由此提升数字劳动的工作时长与强度。在监督控制下,劳动时间不再受限于传统劳动时间界定,数字监视不仅仅局限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而是已经深入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活动中,从而形成了数字劳动监视。这种劳动过程的数字监督化不仅具有劳动时间剥削的意义,更刷新了劳资伦理关系。

### (三)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缺乏整体观

相较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剥削有其特定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性质,仍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前学界更多将焦点关注在具体的数字劳动形式与关系上,仍缺少对数字劳动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因而也伴生出对数字劳动时间剥削认识的不完整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缺乏与新型数字劳动观相匹配的系统性批判意识

整体上看,学界对数字劳动时间的散点式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批判。一是缺乏对数字劳动者群体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的研究。新型数字劳动观的构建,需考察实践主体即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形式、特点、规律及其合法权益。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为零工经济

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劳动者“进场”的诸多可能。但数字平台在客观上为进一步加剧劳动剥削提供了新条件,数字劳动者遵循平台规则就会遭受数字平台隐形监视,如果数字劳动者不接受平台规则便会被排除在外而失去劳动机会。由于缺乏健全的数字劳动制度和法律保障,劳动者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现象频发,零工模式下就业者权益保障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采取有效的立法手段等措施让平台承担应负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责任和建立事实劳资关系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以遏制“数字剥削”。二是缺乏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价值创造规律和机制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框架,总结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概括数字劳动过程的新特点,探索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认识新型劳动观的本质和劳动价值创造的机制与规律,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范式上的创新、社会主义数字劳动关系提供学理视野。三是缺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数字劳动者利益的保障问题。从理论上讲,宏观制度设计应聚焦如何消解算法剥削、数据垄断、数字监控等破坏数字正义和社会公平等价值原则,并以此为基础从宏观政策层面完善数字治理体系。这既是维护数字劳动群体应得利益的重要保障,也是数字劳动合理规范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更是国家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这同时也意味着有必要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性理论成果纳入数字中国建设的总体框架中,着力为数字劳动者提

供更健全的政策保障,并以此促进数字经济制度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

## 2. 缺乏从劳动关系角度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

一是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展,在生产要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呈现出数字化和智能化特征,但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否认,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但是,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核,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垄断属性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限度。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的“外衣”掩护之下加剧了时间的资本化与商品化,这一切仍是以劳动剥削和资本增殖为基础的。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时间的占有、数字经济对劳动时间的支配性影响、资本对数字劳动衍生产品的控制,都表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垄断属性的强化特征,其本质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型拓展。二是缺乏从所有制关系角度考虑数字劳动及其伴生的数字劳动时间问题。数据作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数据所有权问题尚未明晰,亟待理论上的澄明,这也是避免劳动者付出劳动时间却“劳而不得”并摆脱无偿充当数据生成工具命运的必然要求。因此,以共享逻辑破解数字劳动时间剥削的问题成为深入研究的突破口。理性地看,共享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无条件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其更强调用公有化共享逻辑替代资本唯一的逻辑,并主张通过建立公有制数

字平台的方式将数字劳动转化为数字工作,以此倡导数字文明与人的数字生存价值观,这应该是破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困境的生产关系方案。

## 四、理性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学理展望

数字生产方式衍生数字劳动新范式与新范畴,带动人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新命题,引发数字劳动的新讨论。学界已然形成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共识,揭露了数字劳动时间剥削的本质,但与快速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实践相比,理论批判仍滞后,更缺乏超越批判的理论创新。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迫切需要以辩证思维构建数字劳动时间批判的理论体系、运用交叉学科叙事方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批判体系,以及以问题导向构建超越劳动时间异化的理论方案,这将成为今后理论批判的重要方向。

### (一) 以辩证思维构建批判数字劳动时间剥削关系的理论体系

“数字时代时间依然是数字资本主义运行体系和数字资本增殖的内核和关键。”<sup>[37]</sup>客观而言,构建数字劳动时间批判整体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利用整体观和矛盾观来认识和分析问题,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目前,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的批判往往局限于对剩余价值生产环节的批判,强调其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

在生产端,除了数字资本家外,各个分包平台和运营平台都在其中分割剩余价值;而在资本分配完成后,这些资本家还会通过对数字用户的数据再度剥削。在消费端,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收集大数据信息,进行数据资本的再生产。而这些数字用户很可能与数字工人属于同一群体,从而造成了对劳动者的二次剥削,更严重的是,数字劳动者的消费过程还受到利用大数据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的“信息茧房”“信息漩涡”等的操控,并引发消费异化。可以看到,“产消一体”劳动形态往往伴随着劳动过程的虚拟化和劳动力的异化,从而导致劳动时间的无形化和剥削的深化。为此,需要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加强数字劳动时间的规范和管理,对数字劳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保障数据隐私安全并促进数据共享,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增加引导和规约数字劳动的内容,赋予其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

须明确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产消一体”剥削模式背后依靠的是数字技术,“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在属性上应当归于数字消费而非数字劳动,并未创造剩余价值,而旨在实现剩余价值”<sup>[38]</sup>,其实质受到资本逻辑与算法逻辑的规训,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这既要求关注生产的技术性维度,又要求关注生产的社会关系维度,二者辩证结合以透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批判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其剥削问题的批判,而是要以综合的视角辩证批判,尤其需要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进行互动性批判,推动理论批判工作既具整体性又有深刻性。

## (二)综合运用交叉学科叙事方法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批判范式

唯物史观启示我们,不仅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要以此为方法论对数字劳动实践和相关理论开展批判。不仅要从事历时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整体,又要从事共时的视角对发展中的数字资本主义形态、表象和本质规律进行综合把握,并据此形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范式。数字技术的发展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已然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总体方法论原则,以社会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伦理学、法学等交叉学科方法来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理论视野,分析数字平台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数字劳动者和社会的权力控制。相关研究一方面要面向数字劳动者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形成与时俱进的综合性批判范式与中国式理论方案。

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形成中国式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应立足数字技术特性,秉持数字经济的共享理念,追求以数字劳动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理念。网络的互联、开放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共享特征,也决定了数字经济最终要实现全民共享的价值原则,内在规定了应聚焦生产关系本质层面的批判与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来消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破除资本主义的数据垄断,推动数字共享,让数字产品回归数字劳动者,将数字劳动更有效地配置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发

质。这既是价值主张,也应成为实践方案。这不仅需要理论上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把握,更要用实实在在的政策、技术、方法与工具审视劳动时间,并通过量和质的方法以及跨学科批判的综合叙事手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批判范式。

### (三) 坚持问题导向构建消解劳动时间剥削的理论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推进实践创新和实现理论超越的现实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sup>[39]</sup> 数字技术变革下的数字劳动时间问题,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的关键锚点,是理解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议题,更是构建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方案的理论突破点。

数字技术与资本联合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成为资本牟利工具,因此要批判的并非数字技术本身,而是要批判和反思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下产生的劳动异化与劳动时间剥削。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限中寻求数字劳动时间异化的破解之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鲁德运动时指出的那样:“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sup>[20]</sup>。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规避劳动时间剥削,既需要所有制的本

质超越,也需要公共权力的有为介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sup>[40]</sup> 这意味着,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技术审查机制和法律监管体系,形成面向算法规制、标准制定、安全评估、平台经济等的一揽子治理工具,并以此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的发展环境。这是理论上进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和异化扬弃的关键所在。在数字劳动者面临新型且日益严重的劳动异化、时间异化困境时,尤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视角进行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把握和理论超越,并为超越劳动时间剥削提供理论工具和实践依据,也能为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镜鉴。

## 五、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资本主义已然深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和外延。然而,数字技术所诱发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劳动时间增加的悖论,说明数字劳动只要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背后呈现的资本逻辑就不会发生实质性转变,改变的只是其具体的运作模式。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机制的新特征,也对深入理解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理论界在批判数字劳动时间剥削机制时,尚缺乏与新型数字劳动观相匹配的系统性批判意识,也未能从劳动关系角度深刻把握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这导致

数字劳动时间剥削的批判缺乏整体性。立足新时代,对这一范畴进行再批判、再审视,需要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构建数字劳动时间批判的体系,全面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机制的真实面貌;需要运用交叉学科叙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批判范式,以增强对数字劳动时间剥削机制的解释力和批判力;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构建超越劳动时间异化的理论方案和价值主张。

参考文献:

- [1] 王海稳,马晓媚. 数字资本主义建构逻辑的批判与超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 2000(2):33-58.
- [3] NIXON B.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 labour' in the digital era[J].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14(2): 713-734.
- [4] LUND A. Playing, gaming, working and labouring: framing the concepts and relations[J].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14(2):735-801.
- [5]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6] 杨宇辰.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阈下“玩工”劳动关系的再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8):141-151.
- [7] 谢富胜,邓可为. “劳动新形态”价值创造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析[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3(3): 15-27,157.
- [8] 陈朦,蓝江. 数据、劳动与平台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1):109-116.
- [9] 余斌. “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5): 77-86,152.
- [10] 徐艳如.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视域中的数字商品、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2):92-102,152.
- [11] 邵彦敏,赵文瑄.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J]. *经济纵横*, 2024(3):15-22.
- [12] 张恂.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样态及本质透视——基于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框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76-82.
- [13] 黄再胜. 算法控制、“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LPT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22(11): 97-112.
- [14] 韩秋红,苟娇.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转向[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19-26.
- [15] 张媛,许成安.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J]. *江汉论坛*, 2022(12):13-19.
- [16] 巩永丹.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形塑——当代西方左翼主体理论的样式、困境及矫正[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4): 182-191.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 金栋昌,等: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剥削批判:实践机制、批判进路与学理展望

- 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杰里米亚斯·普拉斯.零工经济的未来[M].张晓思,美事 T2T 团队,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 TREBOR S.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2.
- [23]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24] 魏郡.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困境”:资本逻辑与主体疏离的双重张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1-22.
- [25] 刘云杉.数字、资本与时间的辩证法: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化批判路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7-108.
- [26] 何自力,彭李政.数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研究[J].经济纵横,2025(1):9-21.
- [27] 陆葺.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剥削——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户“数字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J].经济纵横,2019(5):11-17.
- [28] 莫里茨·奥滕立德.数字工厂[M].黄瑶,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 [29] 陈晓仪,常庆欣.从“血汗工厂”到“技术牢笼”: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2(4):14-21.
- [30] 邓观鹏,顾友仁.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本质意涵与批判超越[J].经济学家,2024(11):34-42.
- [31] 聂嘉琪.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12.
- [32] 刘伟兵.科技进步与自由时间的获得性悖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4):70-78.
- [33] 倪瑞华.论技术主义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消解[J].伦理学研究,2004(1):24-29.
- [34] 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35] 何自力,彭李政.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4(3):5-17,129.
- [36] MANOKHA I. New means of workplace surveillance: from the gaze of the supervisor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employees [J]. Monthly review, 2019(9):25-39.
- [37] 温晓年,欧阳彬.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逻辑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50-63.
- [38] 李谧.数字劳动还是数字消费:对数字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辨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88-100.
- [3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责任编辑:杨海挺)